# 中国经济学范式思考:两个层次的契合

朱富强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自改革开放始,实践问题逐渐促发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危机,并出现了占主流地位的"修补"改革观;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现实意识开始上升到了理论意识层面,主张全面采用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替代"改革观逐渐占了主流,但进入 21 世纪后,这一观点又开始受到质疑。文章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需要面临两个层次的契合:一是把探究事物本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实证事物现状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契合起来,这主要涉及到探究当前经济学界两大分支的互补性和差异性问题;二是把西方学术界的经济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机理、社会文化契合起来,这涉及到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本土性问题。

**关键词**:科学范式;中国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8)05-0004-12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显然,中国经济学探究根本上也就是要构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经济学基本范式,而这需要在继承和修正以往各种经济学流派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进行范式转换。

## 一、经济学范式的演化和问题意识

根据库恩范式理论,随着实践与范式不一致的反常现象不断增加,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逻辑空间越来越小,人们开始对原有范式丧失信心,于是便出现了范式危机。在范式危机时期,人们在怀疑原有范式的同时也在开始寻求新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在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各种学派的论争之后,一种最终被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的新理论学说就会取代旧范式而成为新的范式。显然,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经济学的发展大致遵循了库恩范式的转换路径:在中世纪崩溃以及新兴民族国家兴起时出现了关注流通领域和强调国家干预

**收稿日期**:2007-08-15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基金资助项目(07D05)
**作者简介**:朱富强(1971—),男,江苏丹阳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的重商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国家干预下的经济衰败引发了激进的重农主义革命;工业的发展使得斯密在重农主义革命基础上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但对价值的源泉以及“看不见手”的作用认知上的差异却引发了古典主义的范式危机;穆勒在综合了当时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把古典经济学综合成一个庞大的折中体系,但西方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导致边际革命的出现;马歇尔在此基础上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与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结合起来构建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但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却使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迅速瓦解;凯恩斯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市场调节完善性的假说而把产量和就业水平联系起来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但微观理论基础的缺乏使得凯恩斯范式一开始就面临着危机,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更是引发了理性预期革命;最后,萨缪尔森重新将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它基本上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思维并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①],但微观和宏观的综合本身依旧缺乏统一的逻辑基础,且逻辑实证主义支配下的抽象化和数理化发展使经济学理论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因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依旧存在着范式危机。

一般认为,范式的革命和转换是“问题意识”促动的,而“问题意识”则包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挖掘和对经济学理论问题的反省两个方面,前者涉及理论解释力问题,而后者则涉及经济哲学问题(程恩富、张建伟,1999)。一方面,就现实问题而言:在重商主义时期,各国面临着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在生产领域不可能取得快速积累的情况下,就只能依靠殖民掠夺和对外贸易这两条途径;在古典主义初期,基于扩大外贸和殖民途径的财富源已经枯竭,而工业生产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因而如何增加生产性劳动以及如何促进分工成为当时研究的重点;到了古典主义后期,自由放任政策在迅速壮大财富的同时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因而自李嘉图开始的古典经济学家们如穆勒、西斯蒙第、马克思等都转而关注分配问题,并把建立一个合理的分配制度视为建立经济学的基石;随着西方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善和社会制度的日益健全,自边际革命以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逐渐把研究从生产转向个人消费,并把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随着物质财富和物质资本的日益丰富,人们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因而现代经济学把研究重点转向了理性人如何行为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就理论问题而言,尽管经济学本质上是研究如何提高人类福利的,但重商主义仅仅把外在的金银视为财富而没有考虑人类劳动的创造;重农主义虽然开始强调人类创造的财富,但却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局限在农业领域;斯密尽管把生产性劳动进一步拓展到工业生产,但也仅限于生产必需物质品的直接劳动方面,没有考虑到社会迂回生产的间接劳动;同时,古典经济学强调财富的创造,却相对忽视了人们如何最有效地使用财富,因而新古典经济学着重探究了既定制度下个体有效使用资

源的途径,这都是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深化。

同样,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提出也是由这两个"问题意识"所促动的。一方面,经济学本身是一门致用之学,它的基本范式需要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当经验事实与其理论相脱节时,人们就必然会对这个基本范式进行反思。显然,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是:生产力→经济制度关系→经济体制关系→经济运行关系。在这一经济关系分析范式中,经济制度关系处于主导地位,对其他经济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后者只是前者的实现形式。因此,传统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公共领域的经济事物,并与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相适应。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实践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私人领域的经济行为愈益占主流,这也必然会导致原先的理论范式出现危机。另一方面,当一个学科的基本范式面临实践危机的时候,人们必然会不断地"回到"基础理论问题上去加以探讨,探究构成这种范式的那些作为逻辑出发点的理论内容和概念体系。显然,尽管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注人与物以及人与人两方面的关系,但在理论构架上却过于侧重于生产关系以及其上的意识形态层面,过于重视对社会生产关系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的研究,而在对异化进行揭示的同时却缺乏解决现状问题的微观手段,更缺乏对那些相对属于私人领域中的个体行为的分析,从而对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面的内容关注相对不足,从而没有进一步发展具体的工具性手段。以致樊纲(1995)等认为,传统经济学范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很没用"的,无助于许多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无助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无法论证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对商品交换或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重建中国经济学、发展新的理论"范式"等问题。

## 二、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相关争论

像几乎所有的理论发展路径一样,对传统范式的怀疑与批判在很长时期内主要是在传统范式内部展开的,基本的倾向是对传统概念体系的"修补",譬如,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忽视交换以及否定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性这一特点,市场化的实践使学术界首先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经济运行机制,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起初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架存在着两个基本思路:一是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照搬"苏联范式"而没有正确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原意",因而改造原有范式的办法就是"回到马克思",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重新解释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二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而过份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因而应该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能够反映实践新发展的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樊纲,1995)。显然,这两种倾向都认为原有的范式基本上还是

可用的,只是存在着缺陷或严重的缺陷,需要的只是修改或补充,都是在传统范式中探讨新问题。由于它们都没有超越传统范式的眼界,都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又可统称为“修补”改革观。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大量现代西方经济学说引入中国,同时大量的海归学者逐渐赢得了学术话语权,他们又影响了新一代的年轻学子。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学界逐渐产生了对立的学说团体,并引发范式何去何从的激烈争论: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更适合于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在新兴的“主流”经济学者看来②,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基本上已经过时了,已无法面对经济现实,因而已经到了范式转换的时候了,而现代西方经济学本身是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的基础理论体系,西方人创造和发展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中国目前的任务是认真学习、掌握和应用这种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为此,“主流”经济学者极力主张,从根本上放弃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转而全面采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术语、理论和方法,运用西方最近100多年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我们遇到的现实经济问题。正因为该理论的改革取向是将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作为中国的经济学范式,因而它又可称为“替代”改革观。显然,最近10年,中国经济学界的主要声音就是借鉴西方经济学来批判基于“苏联范式”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这种取向已经在国内的主要经济学杂志和主要大学占据了主导地位。

问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果真能够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经济学问题吗?其实,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并且对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很强的解释力,从而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逻辑思维空间和方法论空间,但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适用于市场相对成熟的状况,它提供的是一种成熟的市场制度运作的参照系。由于中国社会的市场机制还很不成熟,因而其理论的解释力和应用性也就大打折扣。一个明显的吊诡是,尽管当前那些“主流”学者极力批判了过去照抄“苏联范式”的做法,但如今却又倾向于模仿和照搬西方的主流经济理论。显然,就如传统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只讲坚持而不讲发展一样,这些“主流”经济学者实际上已经更严重地重蹈了覆辙。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行为功利主义的膨胀和扭曲,当前一些人士更加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他们运用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只是因为这类文章更容易发表,更容易获得职称升迁和课题资助或其他各类奖励。由于缺乏对理论的深入思考和批判精神,盲目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并将其理论套用在中国的实践上,就暴露出众多的问题,因此,10年来盲目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取向最近又开始受到了质疑。

目前,有关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争论主要围绕两个途径展开:第一

个途径是修正原先盲目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倾向,主张把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经济制度环境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第二个途径是重新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中的地位,这涉及到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主从关系。显然,上述两种发展途径各有侧重,共同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提供养分。例如,第一种路径便于我们扬弃地吸收和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些分析工具、检验手段以及一些有启发意义的观点、理论,而这个框架有利于对中国的经济现状进行分析,从而有利于加速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形成;后一种路径则更侧重于经济学的根本性方法论问题:是侧重于本质问题的探讨还是仅仅分析现象,把经济学视为规范的还是实证的,经济学的规范又如何理解,等等。正因为两者属于不同层次,因而把这两种发展路径结合起来更加有助于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当然,在吸收过程中也必须注意两个层次的轻重之别,一个经济学范式的成形首先必须确定其方法论主体,因而后者是主要的。一般而言,古典经济学家形成了从本质到现状的研究路径,它不仅关注现实社会,而且努力剖析社会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的因果机理,借助权力结构来剖析事物本来面目和现实面目之间的差异以批判和改良现实制度。相反,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主要是在既定制度情况下分析现状以及现状是如何形成的。显然,从基本思维来看,古典经济学研究路线更适合对那些属于公共领域的经济现象和问题的探究和解决,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 100 年来所形成的一套较为成熟的分析体系则对解释现状是极有裨益的。

当然,就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而言,仅仅限于上述两种路径的结合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两种路径的经济学根本上都可以说是西方的,是建立在西方人的行为机理之上的。其实,尽管国内的学者往往把基于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和基于新古典范式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立起来,强调两者观点和术语上的差异,但是,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思维上,两者都具有极其相似的特点。就研究对象而言,两者基本上都继承了斯密把生产性劳动限制在物质生产领域的思想:传统政治经济学根据马克思理论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性质,并支配了社会主义国民收入概念和衡量;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主要是物质领域,凯恩斯甚至由此宣称政府部门的活动是非生产性的。就研究思维而言,两者都是西方典型的自然主义思维:西方主流经济学继承和极端强化了李嘉图的抽象化路径,把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抽象出来;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在传统上起源于马克思,尽管马克思本身具有深厚的社会科学的底蕴,但他的研究思维仍具有强烈的自然主义特质,如塞德曼(2003)就指出:“《资本论》之于社会科学,就如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于自然科学”。实际上,自然主义思维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人类社会按照既定的规律一直向前发展,人们也可以后验地从历史资料研究中得出经验规律,这显

然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维;二是人类社会将像自然界一样处于一种均衡状态,这显然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维。

正是由于这两大经济学范式都是源于西方社会,其基本微观行为基础是西方人的,所以,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思维特别是行为机理都是西方的,因而最终构建的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因此,尽管这两种范式都可以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提供积极的养分,但直接的搬用也都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一方面,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都局限在物质领域,而较少关注人类福利的变化,这显然已经滞后于当今社会的人类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它们的研究思维是自然主义的,而较少剖析真实社会中人的互动理性及相应的行为机理,因而无法解释和指导当今社会制度的变革。因此,笔者以为,简单地引进西方经济学的某一流派或者基于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的综合并不足以构建出适合于当今中国现实的经济学,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一方面,从经济学的理论性特质而言,它本身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其实,经济学的根本性目的在于增进人们福利,因而经济学不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包含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二是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显然,前一个内容是寻找人类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的途径,主要是借鉴自然科学所积累的知识。如果仅仅就人与物的关系领域以及物质资源的配置这一问题而言,经济学理论在整个人类社会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是可以大量引进的。但是,后一个内容是要探究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根本上关乎心理学和文化学的知识,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的行为方式和偏好,而一旦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领域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一问题,经济学就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或民族性,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必然涉及到人的偏好问题,而基于偏好的互动也是产生社会现象的根本性因素。也就是说,在分析由人产生的社会现象时,必须从人的行为机理入手,从而就需要考虑不同社会中的人在行为机理上的差异,而不能建立在统一性的自然主义思维之上。特别是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经济现象都必然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经济学必须探究内在于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从而使得经济学的理论本身必然具有本土性特质。

另一方面,从经济学的应用性特质而言,它本身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性,针对的是具体的现实问题。就这一点而言,尽管在整个新古典时期,经济学都集中于物质资本配置的研究,因为当时最为稀缺的是物质资本。但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随着物质资本的积累日趋饱和,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已经转到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正因如此,经济学也不再局限于处理人与物关系的私人领域,相反,有关人类互动行为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中日益重要,经济学也逐渐演化成了研究理性人如何行为的学科,这促使了博弈

论和激励理论这类新学科、新工具的产生。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原先专注于人与物关系的自然主义思维已经不怎么适用了,因为这些新型资本显然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基于个人理性加以任意配置的,而是需要激发人力资本主体的能动性。譬如,一个社会中企业产权的构造根本上是基于激发人的主动性,但由于儒家社会对企业本身的认知和社会价值观与西方社会是不同的,因而在西方流行的委托一代理治理模式在中国就可能是无效的。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是在假设制度相对完善的情况下探究个体的行为,而中国当前的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极不完善,公共领域的探究首先是要完善社会制度,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自然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当前的中国问题基本上没有适用空间。

## 三、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思维

正是基于经济学内含的工程学和伦理学这两方面研究内容,我们说,经济学本质上具有本土性。同样,正是基于经济学研究内容侧重点的变化,我们说,经济学本土化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了。那么,在当前社会中,具有本土性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应该具有什么特点呢?这也应该围绕前面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意识。一方面,就现实问题意识而言,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致用之学,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间都存在密切关系,它的理论和政策都是针对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而且,那些在思想史上享有声誉的经济学家也大多对当时的公共政策提出了积极有效的政策建议,斯密、李嘉图、穆勒、李斯特、西斯蒙第、马歇尔、凯恩斯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就理论问题意识而言,经济学本身应该具有双重的内在逻辑性:形式逻辑的一致性、理论与经验的一致性,前者体现了理论的普遍性,后者体现了经济学的本土性特征,显然,前者已经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获得了较为成熟的发展,而后者正是崇尚“知行合一”的儒家社会的优点。

当然,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它不应仅仅停留在经验生活层次,不能太现实主义,而是要从经验上升到超验层次,要有超越经验的理想境界,如冯友兰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特别是,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首先以一定的“理想目标”为前提,没有目标就缺少了研究的参照系,也就丧失了研究的意义,而任何“理想”目标都是主观的,是社会主体的自身认知,而这种认知又与一个社会的文化背景有关。因此,笔者以为,要构建中国经济学,首先必须了解中国社会的文化、追求以及探索当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那么,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同于西方,经济理论需要解决经济发展或财富增长的问题,这显然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文化不同于西方,经济理论需要建立在一个具有本土性的行为机理之上,这显然不同于西方强调个人主义

的经济人行为。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家社会的文化和认知非常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为儒家本来就非常注重三个层次的和谐问题:一是自然有机体内部的均衡与和谐,这强调个体生命的全面发展,而不仅限于物质需求一隅;二是人际社会关系的和谐,这是强调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有序;三是整个宇宙的和谐,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而达致天人合一。由此观之,儒家所理解的世界和谐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开放的,它具有两个重要的特性:一是共时性,强调现世社会生活世界的和谐,要求建立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二是历时性,关注整个人类的持久和谐,要求考虑世世代代整个人类的利益,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显然,这种理想与西方社会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因为西方社会无论是自然主义或唯灵论的先验思维都不关心人的本质问题,都不是从人的目的来分析社会的发展。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往往把一些源于自然界的原理或神学的"绝对命令"视为社会科学领域中不言自明的公理,并由此演绎出一系列的结论,如主流经济学就把发源于自然的理性简单地搬用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且,即使基于自然和谐的基本观点,主流经济学也往往把社会制度视为既定的与和谐的,或者是霍布斯的野蛮丛林时代理性选择的结果。但显然,基于利益和谐的这种分析缺乏历史性和社会性,而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是静态的,它所依赖的是先验和永远不变的个人主义思维。

基于上述的分析,笔者以为,当前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面临着两个层次的契合:一是把探究事物本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实证事物现状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契合起来,这主要涉及到当前经济学界的两大分支问题;二是把西方学术界发展出来的经济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机理、社会文化契合起来,这涉及到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的契合。

首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今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提高人们的福利。显然,这有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二是社会成员福利的改善。前者主要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长,后者则关系到社会成员应得权利的享有和财富的分配。但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却不能提供有效的指导: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配置,特别是在预算约束下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不涉及到资源创造和人际间的资源分配;另一方面,基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也主要是建立在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而没有深入剖析财富创造中的劳动有效配置以及生产的协作机理等问题。相反,古典经济学不但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还由此展开对生产机理的深入分析,重视人类社会中的分工和协调;同时,也非常关注个体福利的提高,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应得权利的界定问题。其实,古典经济学家大多非常关注社会制度的改良问题,并一直朝着将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相结合的方向努力。例如,穆勒就关

注教育、福利、工会和妇女以及公平问题等各个领域，其改革建议也牢固地扎根于“市场措施”。也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大力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最终转变到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上。显然，中国的现状与古典时期的欧洲有类似之处：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社会制度依旧失范、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但是，当前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却越来越不愿意去读一读斯密、穆勒等人的著作，而是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盲目地搬用到国情根本不同的中国社会，这种“东施效颦”的行为对社会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

其次，作为一个儒家文化的社会，中国人的行为机理根本上不同于西方。按照布罗代尔的看法，一个社会事物的现状是由结构、局势和事件引起的，其中：“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者变化极慢的，但在历史上起经常、深刻以及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包括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传统等；而“事件”则只是转瞬即逝的突发性事变，如革命、跳跃、地震等。显然，由于人类对地理和生态因素已经做了巨大的改造，因而它们对当前社会经济的影响已经大为下降。但是，文化道德因素却是很难在短期内移植或改造的，因而它将对当前经济问题起到重要作用，这是单个人力所无法控制的。例如，尽管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已经遭受了西方的冲击，但基于传统的儒家文化却至今仍然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土壤中，儒家和谐观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政府决策。因此，如果不搞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制度结构，就解决不了中国经济问题，也形成不了真正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学理论和思维。特别是，儒家文化也有助于培育当前大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因为可持续发展实质上反映了一个合理化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工具合理化问题，而且更是交往合理化问题，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而交往合理化体现为人性圆满和社会和谐。显然，这意味着，发展的合理化依赖于现世人之间以及代际之间的合作，前者反映了现世人之间的互惠关系，而后者则体现现世人的责任，因为现世人本身已经承受了先人遗传下来的各种财富，从而也有责任给后人留下足够好的资源。因此，可持续发展观与一定社会的文化伦理有关，依赖于合作性伦理和文明，而这正是儒家文明的基本特质。相反，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承袭了自然主义思维，它在强调工具理性的同时却越来越偏离交往理性的合理化，从而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古典主义而不是新古典主义之间更具亲和力。事实上，尽管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是自然主义的，它的知识是建立在抽象和普遍的原则之上，而理性推理与经验事实基本上是分离的。但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一段时间，出于对神性的反动而出现了对人性的探究，重新把哲学思考从天上拉到了地上，从而开始萌发出了经验主义思潮。而且，古典经济学家基本上都出身于社会科学领域，因而或多或少地

带有经验主义的思维。也正是基于经验的观察和抽象,古典经济学注重对事物本质的探究,并把它作为社会发展的方向。显然,这种思维与传统儒家具有相通性,儒家的认知也来源于人伦日用的经验,但是通过人的知性思维而开始探究社会的本质,并把它视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正因如此,中国的理性具有强烈的具体性,体现为主体性与自然中的客体性自然相结合,因而儒家所倡导的"理"也就成为构建社会和谐与政治秩序的理论基础。但是,新古典主义却向强自然主义思维复归:自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根本无法经由人的改造,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注重对事物的解释而不是改造,它所设立的理想状态不是事物的本质而仅仅是一个观察的参照系,这个理想状态也是根本不现实的和不可实现的。为此,在探究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时,除了吸收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手段之外,应该更多地借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应该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建立"古典为体,新古典为用"的理论体系。

## 四、结　语

尽管自然科学具有普遍性,因而很少有中国物理学、美国物理学、日本物理学这样的说法,但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却介于人文和科学之间,它与特定的社会文化有密切关系,因而经济学本身存在一个本土化的要求。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往往意味着对自然世界认知的增进,因而常常有"进步"之说,但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却是基于对特定社会环境的反应,因而不存在单线的"进步说",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马克思在批判德国经济学时曾指出:"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他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③]。显然,当前我们也要引以为戒,中国经济学范式需要把"西方"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行为机理结合起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分析范式,只有这样才能造就具有根植性的中国经济学。实际上,契合本来就是知识统一和理论发展的关键,通过契合将跨学科的事实和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理论联系起来,可以实现知识的"统合",从而创造出一种共同的解释基础。譬如,就当前分立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而言,两者原本是统一的。其中,西方主流经济学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而政治经济学则保持了对"人"的关注,分析具体社会关系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因此,两者的研究各有侧重,但也各有片面,目前就需要重新审视两者的互补关系,并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路径。

然而,迄今为止,国内的经济学还处于割裂状态:一是长期以来存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互排斥的二元学科结构;二是经济理论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存在严重脱节。因此,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就面临着

两个层次的契合：一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契合；二是经济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之间的契合。为此，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重在对两大范式的研究对象、涉及内容、研究方法之差异性和互补性的挖掘，探悉经济学实质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关系，着重对两大范式演化的路径以及理论和社会实践的背景进行梳理、剖析，并将两个相对独立的范式进行契合。显然，基于当前两大经济学范式的契合，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理论观点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表达工具和检验手段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从本质到抽象的研究路线，形成较为完整的四层次理论研究框架（朱富强，2006），同时，将经济理论建立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之上，用基于儒家社会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来修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可以更好地分析中国的经济现象，从而为中国经济学奠定基本分析框架。因此，如果中国经济学范式建立在这两个契合的基础上，那么，就不仅可以有利于经济理论的真正发展，还可以更好地指导社会改革实践，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中国人行为机理探索的深入，必然在世界范围内会出现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

---

**注释：**

①所谓主流，泛指现行学术研究观点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多数，主要包括研究者人数和刊物，但本文并不在概念上作繁琐讨论。

②这里的“主流”学者是指基本继承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思维、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的学者，他们在国内的研究队伍中的人数和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数量越来越多。

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参考文献：**

[1]程恩富，张建伟.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J].经济学家，1999，(3)：78－82.

[2]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樊纲.“苏联范式”批判[J].经济研究，1995，(10)：70－80.

[4]贾根良.西方异端经济学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激烈转向[J].社会科学战线，2005，(3)：43－51.

[5]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

[6]吴易风.两种“范式危机”论[J].当代经济研究，1996，(2)：31－39.

[7]朱富强.经济学计量化的反思[J].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6，(4)：5－11.

[8]D Bell. The 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M].New York：Basic Books，1981.

[9]R D Wolff. Economics：Marxian versus Neoclassical[M].Baltimore/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

（下转第86页）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this dissertation analyz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RM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i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We assume that a negative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IIRI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and similarly about the influence of the index of intercommunion quality on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IRM, especially corporate strategical communion with investors, indeed plays a role in lowering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providing support for initiating IRM by listed companies and promoting IRM by regulators.

**Key words**: investor relation management; cost of equity capital; residual income discount model

(责任编辑　金　澜)

(上接第 14 页)

# A Modest Proposal about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Economics: Two Level Consiliences

ZHU Fu-qiang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ractical problem caused the crisi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paradigm, and "patch" reform view which occupied mainstream status appeared. After 1990s, problem consciousness rose to the level of theory consciousness, and "substitute" reform view which advocates adopting modern western economics paradigm comprehensively began to be on mainstream. However, "substitute" reform view also meets more and more predica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21century. In fact, there are two levels of consilience to construct Chinese economics: the first takes place between Marxism economics and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the second occurs between the theory of economics and the behavior mechanism of Chinese.

**Key words**: science paradigm; Chinese economics; Marxism economics; mainstream economics; indigenization

(责任编辑　金　澜)